

西方政治思想译丛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李强 主编

魏玛共和国的 反民主思想

[德国]库尔特·松特海默 著

Kurt Sontheimer

安尼 译

译林出版社

西方政治思想译丛

魏玛共和国的 反民主思想

[德国]库尔特·松特海默 著

安尼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思想 / (德) 库尔特·松特海默著; 安尼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11
(西方政治思想译丛)
ISBN 978-7-5447-7234-1

I. ①魏… II. ①库… ②安… III. ①政治思想史 - 研究 - 德国 - 1918-1933 IV. ①D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5363号

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y Kurt Sontheimer
Copyright © 1962 by Nymphenburger in der F. A. Herbig Verlagsbuchhandlung GmbH, München
www.herbig.net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37号

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思想 [德国] 库尔特·松特海默 / 著 安尼 / 译

责任编辑 王蕾
装帧设计 韦枫
校对 梅娟
责任印制 单莉

原文出版 Nymphenburger Verlag, 196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 × 1020毫米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234-1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丛书主编 李 强

丛书编委 (按汉语拼音排序)

贝淡宁 (Daniel Bell) 曹卫东

丛日云 冯克利 高全喜 霍伟岸

刘 擎 秋 风 任剑涛 王 焱

丛书序言

自东汉末年佛教东传，梵客华僧，络绎于途，翻梵为秦，流布天下，极大地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前贤移译异域经典的努力，不仅令后人敬仰，也为我们留下不灭的典型。

近世海通以降，特别是晚近二三十年来，译介西方政治理论的著作已经蔚成风气，但近来学界翻译的选目，却多偏重于当代作品。此中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些理据：其一，当代理论关注现实问题，往往有较高知名度，读者会更加认同。其二，自进化论在近代传入中国后，国人对“进步”的观念坚信不移，认定新学问必然代表知识进化的更高阶段，包含更高、更全面的真理。但是，这种厚今薄古、贵近贱远的倾向，往往会忽略政治理论中一些最深层的问题。

所谓政治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关于秩序的理论。人类秩序之构建至少必须处理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认同问题，涉及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人类与超越价值之间的关系等；第二，政治制度问题，涵盖诸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统治权威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政府内部之结构功能与运作等；第三，公共政策问题，涉及政府在具体问题上的政策原则、目标及实施程序等。若如此理解政治理论，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视界便显得颇为狭窄。当代西方社会由于基本完成了制度构建的历史使命，认同问题似乎也不构成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故而其政治理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公共政策

方面,即探讨“谁应该得到什么”的问题。假如这样一种狭窄的理论视角构成汉语学界心目中西方政治理论的景象,恐怕无法真正理解西方现代政治的构建原则,无法理解现代政治秩序形成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我们思考中国问题难以提供有意义的启迪。

为了弥补国内政治理论翻译中的这些缺憾,使读者对西方政治理论的历史演进与复杂内涵有更全面的理解,这套丛书希望从理论、历史、制度相结合的视角,选择译介西方政治理论中的重要著作。丛书关注的重点是政治思想,但在考察思想时,更加注重历史与制度的视角。它强调将政治理论放在历史的情境中理解,考察理论得以产生的背景及试图解决的问题;它关注历史的多样性与理论的复杂性,而不试图仅仅以理性为基础抽象出亘古不变的政治原则。它在历史考察中强调理论与制度的结合,既关注一个时代政治制度的结构,又力图展示重要思想家对当时制度的理论思考,从制度与理论结合的视角探索西方现代政治的历史演化轨迹以及隐含的原则。

我国中古时代,人们对于移译佛教经典,曾经有经、律、论三藏何者为先的讨论。晚近提倡阅读西方经典原著也成为一时潮流。然而,对于这些来自异域殊方的原典,如果缺乏历史语境的背景知识,难免望文生义,难解真义。有鉴于此,我们这套丛书,也将精选一些重要的二手研究著作,以促进读书界对于原典的真正理解。

译丛之设,已有很多。这里略述编辑旨趣,求其友声。究极而言,是为了假自他之耀,更全面地展示西方政治发展与思考的全貌,为国人思考政治问题尽绵薄之力。

目 录

平装版前言	1
-------------	---

引 言	1
-----------	---

第一部分 政治非理性主义

第 一 章 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团体	11
第 二 章 时代精神视野下的反民主思想	26
第 三 章 非理性主义的政治化	36
第 四 章 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国家法学	45
第 五 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战争体验	68

第二部分 反民主思想面面观

第 六 章 反民主主义的自我理解	87
第 七 章 反民主批评	110
第 八 章 反自由主义的国家思想	152
第 九 章 呼唤领袖	171
第 十 章 帝国的幻象	179
第 十 一 章 反民主思想的基本概念和本质特征	197

第三部分 卷入政治

第 十 二 章 国家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革命	227
第 十 三 章 脱离魏玛运动	236
第 十 四 章 论魏玛共和国的思想	248
参考文献	257
人名索引	266

平装版前言

这部《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思想》，同时也是我获得政治学教授资格论文，于1962年首次付梓。该书受托于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那里是我从1957年年中直至1959年年底工作的地方。不过，研究所的专家组无法决定把这部作品收入他们的书系，因为当时有几位成员觉得，我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右翼反民主思想的批判过于激烈。于是，该书就作为独立的单行本由慕尼黑宁芬博格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的经理贝托尔德·施邦恩贝格，此前已然令我心怀感激地接收了我的第一本书，那本政治学—文学研究专著《托马斯·曼与德国人》。而这本关于魏玛的书经过数次再版，日益成为解码魏玛共和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文献。这促使作者和出版社在1968年推出该作品的简装学术版。我本人对这个学术版的内容做了删减，篇幅大约占原作的四分之一。尤其是对反民主文献的引用部分，在无损于思路的前提下，进行了删减。我认为，瘦身之后的内容更胜一筹。

这本平装版也以学术版文稿为基础。出于现实原因，我曾对1968年版进行过三十页的补充，内容是“联邦德国的反民主思想”。再版时，我把这部分拿掉了，因其内容已经不再具有时效性。1978年，联邦德国的思想政治局势已经完全不同于1968年。当年，似乎新的右翼反民主势力就要登上联邦德国的政治舞台——谢天谢地，极右翼的德国民族党（NPD）的崛起只是昙花一现——他们多少跟魏玛时代的反民主思想有直接关联。我一直认为，针对自由民主制度的那些来自右翼的反民主趋势在联邦德国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一

直蛰伏着,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就会东山再起。尽管如此,从眼下的局势来看,我倒并不觉得极右思想会对联邦德国造成任何重大威胁。

一部关于联邦德国重要政治思想的历史(当然还有待展开),将会揭示出,右翼反民主思想首先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后半程蔓延于联邦德国。第一波极右翼浪潮,随着阿登纳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成功得到了相对迅速的吸收;60 年代中期的“新纳粹”,影响延伸至联盟党派,被德国政治中强劲的左翼趋势所超越。这个趋势最终促成维利·勃兰特领导的社会自由联盟,并借由学生运动得到最激进的表达。对联邦德国反民主思想的研究,必须着眼于最近这十年,并且首先聚焦政治极左思想;因为,极左思想目前在联邦德国比右翼反民主思想更加强势,影响更大。在我的新书《我们知识分子的痛苦:联邦德国的左翼理论》(汉堡 1976)中,我详细研究了对体制持批判态度的左翼政治思想急速而富有影响力的发展状况。这部作品在某些方面构成了我的魏玛之书的反题。一些批评家因此指责我,说我应该放弃在魏玛之书当中的以及此后的立场,说我会从一个批评右翼者变成一个批评左翼的右派。

我并不这么看。相反,我觉得自由民主制的敌人不仅仅存在于右翼阵营里,而且也存在于左翼当中。今天,令我们的政治体制受到考验的主要是左翼政治思想;而在魏玛共和国,令自由体制失去思想根基的则主要是右翼政治思想。右翼政治思想在内容上当然与左翼政治思想有所不同,但是,谈到自由民主制的存续,涉及对共和国的捍卫之时,那些敌对的、日趋极权化的意识形态究竟来自哪个阵营,就无所谓了。自由的民主制要想幸存下来,就必须在这些意识形态面前进行自卫。这是魏玛留给我们的经久不衰的教训,通过本书可以感知一二。

这个教训,对于联邦德国仍然具有警示意义。

库尔特·松特海默

1978 年初于慕尼黑

引言

德国右翼反民主思想在魏玛共和国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未得到历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¹ 常见的引用材料对此几乎从未提及，虽然关于造成魏玛共和国急剧瓦解并最终惨败的原因，已有大量史料文献。本书的主导意图之一便是，揭示反民主思想运动对于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意义。魏玛民主的内在缺陷及其衰亡，与反民主思想的影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12

在联邦德国，有些知识分子抱怨思想和政治层面上的顺从主义。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以魏玛共和国时期多姿多彩的政治思想格局为榜样。在我看来，他们在批评我们的公共意识渐渐趋于单一化之时，往往忽略了一点：民主政

¹ 针对历史关联的重要参考，见 Bracher,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2. Aufl., S. 150 ff., 另可参照 W. Bußmann, „Politische Ideologien zwischen Monarchie und Weimarer Republik“, in: *Hist. Zeitschrift*, Bd. 190, (1960)。更多纯粹思想史内容可参见 Armin Mohler,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32. Grundriß ihrer Weltanschauungen*, Stuttgart 1950, 该书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Klemens von Klemperer, *Germany's New Conservatism*, Princeton 1957, 其德文版为 *Konservative Bewegungen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München 1962。Jean Neurohr, *Der Mythos vom Dritten Reich.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57。关于国家布尔什维主义及相近思潮参见 O. E. Schüddekopf, *Linke Leute von Rechts. Nationalbolschew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Stuttgart 1960。Chr. Graf von Krockow, *Die Entscheidu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Ernst Jünger, Carl Schmitt und Martin Heidegger*, Stuttgart 1958 论述了居于核心地位的思想模式。通过 W. Gerhart (化名 W. Gurian), *Um des Reiches Zukunft*, Freiburg 1932 可见，这些思潮在当时是如何得到表述的。另外富有启发性的文献还有 H. Rauschnig, *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 New York 1941。其他针对个别题目和作者的大量专题研究，将在后文中给出。

体中的公共意见即便对行政持批判态度,原则上也应遵从现存政治秩序的基本决策。民主政体的效力,来自自治国家中基本原则的协调统一。若无法达成统一的意志,就无法实现自由的民主制。魏玛共和国覆灭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没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国家意识。然而,国家意识不仅仅是政治功绩所造就的,并非首先与经济富足相关,也绝非依赖于历史的恩赐——比如历史在关键时刻把伟大的政治领导赐给一个民族,实际上,国家意识存在于公民自身的责任之中。魏玛共和国缺乏一种能自觉与这个民主共和国紧密相系并与之步调一致的国家意识。许多德国人在思想上忠于祖国,或者认为国家高于一切,可是,这些对于魏玛共和国却无济于事。向一种遁入历史或未曾实现的国民思想效忠,就跟单方面效忠于某一社会阶级一样,对这个共和国无甚益处。“自由知识分子应该身体力行并提供帮助,而不是在一旁冷嘲热讽。这是魏玛灾难留给我们的众多教训之一。”(戈洛·曼)魏玛共和国中的反民主思想,成功地让大多数德国人民疏远了魏玛宪法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制度。为了理解广大知识分子(既包括右翼也包括左翼)在当时的姿态和政治立场,历史学家找到了许多原因。然而,可以理解却无法原谅,因为,即便一切思想政治传统都有其重要性,即便有批判价值的政治现象得到了丰富,可是,对于灾难的共同责任,却难以磨灭地残留至今。

这项针对魏玛共和国反民主思想的研究,首先并不是一部纳粹思想前史。如果试图把本书所介绍的思想运动同所谓的纳粹世界观进行比较,肯定会无功而返,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明确而完备的纳粹意识形态。其实,我更想揭示的是,反民主思想乃魏玛共和国瓦解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的作用不只在于,使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在精神和思想上被广泛接受,而且还在于,首先它曾经拒绝为民主共和国提供精神支柱,而那正是魏玛所急需的。如此一来,纳粹以及另外一些抵制魏玛“体系”的集团才拥有了煽风点火的条件。

本项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反民主集团,而在于其思想理念。无论这些集团彼此间有多么千差万别,它们所奉行的理念却统统构成了魏玛宪法自由民主的反题,甚至成为戕害民主的利器。本文旨在系统性地为反民主思想勾勒一

幅肖像,而并非对于反民主思想者进行专题研究。

魏玛共和国里的舆论力量究竟是如何针对自由民主政体展开攻击的?这也是我们的主导问题。有哪些特别重要的公共批评模式?这些批评的背后体现了哪些具有建构意义的主导思想?反民主思想的负面功能,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民主制度的反对,从原则上说,伴随着对建立另一种形态的国家政体的支持。

假如能看出“反民主主义者”所持的不仅是一种毁灭一批叛的反姿态,而且往往还怀有一颗积极改善之心,那么,当读者认定这本书根本不是在谈魏玛共和国整体的反民主思想,而几乎只是在谈右翼的反民主思想时,使用“反民主的”这个术语就显得十分可疑了。德国共产党及其亲缘党派无疑也同资本主义的魏玛共和国针锋相对过,他们当然在自己的宣传单里宣扬过反民主思想,但是他们的思想类型跟右翼的反民主思想有着天壤之别。因此,若将前者也归入右翼思想体系,并不妥当。此外,针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党的态度及发展情况,已经有过一些研究资料¹,基于此,如果本文再将不同的思想观点杂烩一炉,便显得多此一举。反民主的结论,当然是指极左派以及本文接下来首先要详谈的那些人。除此之外,详尽地研究反民主的右翼所遗留的政治思想,本身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价值:从魏玛共和国衍生出来的并非一个共产主义专政,而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元首制政体,从右翼发展而来的思想将为这个政体的存在辩护。极左派在共和国奄奄一息之际的确火上浇油,可是最终,共和国是被右翼所摧毁,并且,被萌生于右翼的思想所击败的。

对于本文所用素材,我将选择范围有意限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我没有引用1919年之前出版的反民主文献,也没有试图将某些思想的历史追溯至其发端期。在反民主的右翼集团里,年轻的或新兴的国家社会主义还常被另称作“保守主义革命”,他们的出版物得到了最有力的关注。这是因为,这一集

¹ Ossip K. Flechtheim, *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Offenbach 1948. Ruth Fischer, *Stalin und der deutsche Kommunismus*, Frankfurt 1950. Lionel Kochan, *Rußland und die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55. Siegmund Neumann, *Die deutschen Parteien, Wesen und Wandel nach dem Kriege*, Berlin 1932. Schüddekopf, op. cit.

团的思想活力最强。另外,很难将新兴的国家社会主义理念与民族的、德意志国民的理念截然区分开。彼此间的过渡毫无障碍。与此同时,在共和国最后的关键几年里,年轻的右翼民族分子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

若对这些素材作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值得商榷之处:给针对魏玛政体的论点全部贴上反民主的标签,是否合适?还有许多反民主主义者是为了争取一个更好的民主才去反对魏玛体系的。反民主这一概念首先是以民主思想的形态出现的。这个思想自然可归入我们所熟知的政治观念的多义性当中。尽管如此,还存在一个有意义的评判标准:遵照魏玛帝国宪法模式的民主思想。在反民主的思想里,有一个跟民主思想敌对的态度,正如魏玛宪法所理解的那样。它表达了对魏玛政体的敌视态度,这种态度不再从属于一个合法的民主范畴内的对立概念,而是从根本上反对自由民主共和国。尽管为数不少的反民主主义者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意代言人,但此处可能出现的矛盾却是,他们对于自己所不敌的民主存在错误理解。从本质上讲,自由思想属于民主思想的一部分。民主只意味着自由和平等。一个没有权力分配、没有法治国家、没有个人自由权、没有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支柱的民主制,不是真正的民主,不管如何去解释民意。

民主既不是一个塑造政治意志的技术工作原理,也不是为臆想中的民意开出的空白支票。它是一个满载价值的政治秩序,目标是保障政治共同体处于有序的自由状态。

16 德国历史学家和国家法学者们在过去非常重视把民主同自由主义相分离,并且尽可能去定义一个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尝试厘清概念,这点无可厚非,然而事与愿违。结果,他们所构想的民主,其权威的或极权的结构只能通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统一意志得到确保。如此类型的民主不符合魏玛宪法的精神,后者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法。就此而言,将反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视作反民主的,也就完全合理合法了。

尽管这或许是对魏玛共和国具体状况的公然无视,可人们并不想看到,当时的反民主思想还从自由民主宪法及其政治影响力的不足之中得到了动力。魏玛宪法运作不力。因此,这个民主的相对残缺性,为反民主主义者批评的范围和力度提供了条件。没有魏玛政体著名的缺陷(尽管这很大程度上

不是魏玛宪法的问题),反民主思想不可能在后来泛滥渗透。另一方面,反民主主义者的猛烈批判,反过来影响了政治关系,阻碍了民主的内在稳定性。

一个团体通过大众传媒和知识分子所表达的政治观点、所发起的攻击,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思想状态而言可能没什么意义,其影响范围仅限于一小撮满腹牢骚者和吹毛求疵者。对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现实稍作一瞥,即可看出,反民主思想并非什么神棍的事业,而是大量政治集团及党派的意识形态,这些集团和党派把阻止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明确目标。反民主思想不仅仅成了政治不满者的标志(他们通过传单和文稿宣传造势),而且还为有组织的仇恨和政治狂热提供了意识形态工具和思想装备。反民主思想跟无数思想领域以外的因素共同起作用,这些因素阻挠健康稳定的民主格局出现在魏玛共和国里,是仇恨和消极姿态的酵素及其意识形态外壳。假如说反民主态度的起源本身不一定能成气候,那么共和国的反对派还需要心理上的合理化。从意识形态上论证针对共和国的仇视态度,成了反民主思想的本质功能。

就此而言,反民主思想是政治反对派对抗魏玛不可或缺的“废物”。没有这种思想,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将不可想象。随着反民主思想的传播以及反民主的宣传口号本身对民主壁垒的破坏,大多数民众完全丧失了巩固民主信念和行动方式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严格地讲,除了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再没出现过。以人民为本的国家观念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民主思想很快陷于守势,而反民主的思想体系最终扮作以革命推翻政权的布景,扮作一种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工具——实际上,这场革命与其说是思想性的,不如说是对权力的争夺。¹若非反民主思想的普遍传播所营造的思想气候,纳粹是不会成功夺权的。反民主思想并未直接为纳粹做准备(为此还需要更多条件),但是,反民主思想在民主共和国的散布,使精神基础遭到破坏,国家意识遭到瓦解,并且从此无法自我修复。

只有当民主国家失去了稳定的国家意识,纳粹才有可能得逞。因为只要

1 跟许多纳粹分子不同,保守主义的革命者们重视的是思想性。埃德加·容(Edgar Jung)于1933年3月发表在《德国观察》(*Deutsche Rundschau*)上的一篇文章清楚表明了这一点:“权力被夺去了,可见,权力冒着思想之名被施加,从而为自己在历史面前辩白!”(第160页)另可参照Martin Broszat,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 Weltanschauung, Programm und Wirklichkeit*, Stuttgart 1960富有见地的分析。

18 有积极的、民主的国家意识；民主在对外政治和经济的交困中就能够保持岿然不动；因此，了解魏玛民主体系被哪些思想工具所侵蚀，也就具有了正面的意义。这种侵蚀当然不仅是反民主思想涌入公共意识的结果，同时某种程度上还是民主主义者间接导致的，或可部分归咎于他们的疏忽。这样一来，对反民主主义的鼓吹者们而言，他们的批评开展得也就更加轻而易举了。

下面的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是整篇论文的核心，是对反民主思想的集中阐述。在第一部分里，我明确了反民主思想的精神前提。结果证明，这正是本世纪最初几十年里强大的非理性思潮在政治中的对应物，这种思潮也深深地影响到了科学领域。关于德国国家法学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发展状况所作的专题研究，目的正是为了阐明其间的关系。此研究是勉为其难，因为从本性上看，这门科学与政治以及国家秩序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另一方面，在研究进入系统部分之前，把世界大战的经历当作反民主思想的多重出发点来单独介绍，显得十分重要。直至本文第三部分，才论及研究的历史功绩。这一章将对那个尚有争议的问题做出解释：右翼的反民主思想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纳粹当中，在多大程度上辅助纳粹崛起。第四部分讲的是与当下政治的关系，并概述了联邦德国的反民主思想。

19 在本论文中，我有意为逐字逐句的引文留下相对宽泛的空间。只有在忠实的引文里写下的东西才是完整的，如其最初所是；也只有这样，那些偶尔不可信的表象才会具有可信性。本文对素材作了系统梳理，这样做有一个优点：可以从深度和广度上阐发反民主思想，并使之一目了然。不过为此还要承担另一个风险：对于某些作家的作品，本文只涉及局部，而其各自的动机和背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给予说明。我为右翼知识分子的政治形势作了一幅画，当代史方面的研究将结合大量细节研究和个案观察来充实这幅画，使之更加生动。尽管如此我仍相信，通过研究魏玛共和国以及德国的政治思想史，可以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至今尚无人问津，然而在我看来又不应忽视的现象上来。

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右翼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浪漫的、非理性的因素蔓延到政治领域的结果。这些因素是非政治人物的观察，它们屡屡把唯美

主义当作政治智慧。革命者冲锋陷阵,本是为了赢取未来,结果非但没有用自己的精神服务于理智从而掌控现实,反倒成了反动势力的推手。这一思想在卡尔·施米特那里得到了印证。尽管施米特并不知道自己也是一位高级别的政治浪漫派,却说出了富于预言意味的话:

一切浪漫派都在为其他的非浪漫力量服务,把自己在下定义和作定论方面的优势,转变成对陌生力量和陌生结论的俯首帖耳。¹

20

¹ Carl Schmitt, *Politische Romantik*, 2. Aufl., München und Leipzig 1925, S. 228. 参见 Krockow, op. cit., S. 82 ff.

